



JIUQUAN LISHI WENHUA CONGSHU

|酒|泉|历|史|文|化|丛|书|

敦煌文化与敦煌学

DUNHUANG WENHUA YU DUNHUANGXUE

孙占鳌 /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JIUQUAN LISHI WENHUA CONGSHU

|酒|泉|历|史|文|化|丛|书|

敦煌文化与敦煌学

DUNHUANG WENHUA YU DUNHUANGXUE

孙占鳌 /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文化与敦煌学 / 孙占鳌主编. —兰州: 兰州
大学出版社, 2013. 10
(酒泉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311-04290-5

I. ①敦… II. ①孙… III. ①敦煌学—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9328 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施援平 武素珍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敦煌文化与敦煌学
作 者	孙占鳌 主编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 (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 (营销中心) 0931-891429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58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290-5
定 价	5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酒泉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马光明

主 任 都 伟

副 主 任 柴绍豪 孙占鳌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彪 王玉福 王多胜 王安平 王丽君

成茂和 吕积清 刘文泉 江学录 杜志学

李 明 李 耀 张录仁 张 鸿 张 满

张鼎三 赵存福 贺华东 秦 川 贾其全

曹 诚 龚德平 韩积罡

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

《敦煌文化与敦煌学》

主 编 孙占鳌

编纂人员 李金寿 张 瑛 张宏伟 刘生平

前言

敦煌是“北中国保存汉族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1〕}。自从张骞“凿空”西域,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塞重镇。人流、物流、商流在这里积聚,政治、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儒学、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共处,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敦煌文化从中国到世界迅速传播,敦煌学研究蓬勃兴起。一百多年来,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日益兴旺的国际显学。

敦煌文化是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窗口。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曾经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中西方文明在这里会聚、交融,形成一种以中华文明为主、中西文明兼而有之的文明类型,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交流融合的典范。敦煌文化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性文化,也是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敦煌文化向世人表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同时存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这对探究经济全球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敦煌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文化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语言、历史、社会、教育、科技各个领域,并有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众多文种,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文献宝库,是展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敦煌文化是世界罕见的艺术宝库。敦煌石窟现存洞窟 853 个,壁画约 52000 平方米,彩塑 2400 多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也是研究古代艺术的珍贵史料。

酒泉是敦煌文化的摇篮和故乡。酒泉人民作为敦煌文化的创造者,也应该是敦煌学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传承敦煌文化,将敦煌学发扬光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组织编写了这部集敦煌文化的主要形态、敦煌文化的主要特征、敦煌学的学科特色、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现状为一体的《敦煌文化与敦煌学》,旨在综合介绍敦煌文化与敦煌学,倡导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敦煌学研究、传播敦煌文化。

都伟

2013 年 8 月

目 录

第一章 敦煌历史文化概要 / 1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敦煌 / 1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敦煌 / 7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 13

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敦煌 / 19

第五节 五代宋夏时期的敦煌 / 28

第六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 / 32

第七节 明清时期的敦煌 / 35

第八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敦煌 / 40

第九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敦煌 / 44

第二章 敦煌石窟 / 49

第一节 莫高窟的营建 / 49

第二节 莫高窟北区 / 79

第三节 莫高窟的营造者 / 81

第四节 敦煌石窟群 / 88

第三章 敦煌艺术 / 102

第一节 建筑艺术 / 102

第二节 彩塑艺术 / 108

第三节 壁画艺术 / 119

第四节 飞天艺术 / 139

第五节 乐舞艺术 / 145

第四章 敦煌遗书 / 151

第一节 敦煌遗书的主要内容 / 151

第二节 敦煌遗书的流散 / 166

第三节 敦煌文献的收藏 / 172

第五章 敦煌史迹 / 182

第一节 敦煌汉简 / 182

第二节 关城烽燧 / 192

第三节 古道驿站 / 199

第四节 河渠墓葬 / 202

第五节 碑铭器物 / 204

第六章 敦煌学的兴起 / 210

第一节 敦煌学的前奏 / 210

第二节 藏经洞的发现 / 212

第三节 敦煌学的起步 / 220

第七章 敦煌学的发展与繁荣 / 241

第一节 大陆敦煌学研究 / 241

第二节 港台地区敦煌学研究 / 275



第三节 国外敦煌学研究 / 283

第八章 敦煌学的学科特色 / 310

第一节 敦煌学的材料 / 310

第二节 敦煌学的体系结构 / 313

第三节 敦煌学的学科分支及研究方向 / 325

第四节 敦煌学的研究方法 / 332

第九章 敦煌文化的特征与价值 / 342

第一节 敦煌文化的特征 / 342

第二节 敦煌文化的价值 / 352

第十章 敦煌石窟保护 / 357

第一节 敦煌石窟的损坏情况 / 357

第二节 保护机构 / 365

第三节 传统保护 / 367

第四节 工程保护 / 374

第五节 科技保护 / 376

第六节 依法保护 / 381

第七节 综合保护 / 383

附录 / 396

敦煌学纪年 / 396

主要参考书目 / 449

第一章 敦煌历史文化概要

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位于东经 $92^{\circ}13'$ 至 $95^{\circ}30'$, 北纬 $39^{\circ}40'$ 至 $41^{\circ}40'$ 之间。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毗邻,西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哈密市接壤,东、北与瓜州县为邻,是甘肃省酒泉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 18 万人,国土面积 3.12 万平方千米,辖 7 镇 2 乡,11 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56 个村民委员会。敦煌市平均海拔 1138 米,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

敦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期,敦煌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西汉敦煌建郡以后,敦煌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镇、经营西域的前哨阵地、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东西方文化从这里西传东进,形成了多元开放、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敦煌人民创造了一幅幅雄浑壮美的历史画卷。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敦煌

一、远古时期

敦煌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学者布林,在党河流域发现约 1500 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在敦煌以北马

鬃山明水地方,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20世纪80年代在酒泉市所辖的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考古研究表明:敦煌地区在数百万年前,土沃水美、林草丰茂,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

经过古猿人、直立人、智人漫长的岁月演化,从距今250万年前开始,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敦煌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人们以打击方式制造石器工具,过着以采集和狩猎谋生的原始生活。

距今约1万年以后,敦煌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敦煌居民已经普遍使用磨制的生活和生产工具,掌握了陶器烧制技术。经济生活以种植业为主,兼营家畜。社会组织由母系氏族公社逐步演变为父系氏族公社。

新石器时代敦煌的文化遗存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从马家窑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存位置变化来看,分布地域在不断西移。最早的遗存多在渭河上游的天水、武山一带,后来河湟地区成为中心,最后延伸至河西走廊西部的肃州、玉门、瓜州、敦煌一带。

马家窑文化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基本上代表了马家窑文化发展的前后三个阶段。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三个类型之间存在承袭和递接关系,故也有学者主张称之为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期、半山期和马厂期。马家窑文化遗存所展示的社会进步程度,达到了甘肃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之前的最高水平。马家窑文化开始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至少发展到晚期即马厂类型时,对偶家庭已相当稳固,父系氏族社会基本确



立。以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又以灿烂的彩陶艺术为其文化特征,在跨时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分布地域日渐扩大,显示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趋同性^[1]。

马家窑文化在酒泉境内多为马厂类型,发掘的遗址有酒泉下河清(发现四坝文化在上、马厂类型在下的地层叠压关系)、干骨崖(在十余座四坝文化墓葬的填土中亦发现有马厂类型的彩陶片)、西河滩(遗址包含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因素)、玉门火烧沟(遗址包含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因素)、瓜州兔葫芦等。另外在肃州区丰乐红寺村的高疙瘩滩、下河清古坟堆、丰乐涌泉村大树台子等地发现距今 5000 年到 4000 年前后的人类聚落遗址。

马厂时期的敦煌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和骨制的生产工具。从出土的纺轮和骨针看,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马厂的器型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但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器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单耳带鋡的筒状杯。

马厂类型的房址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有单间的,还有吕字形套间和多元套间的房址。有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平地起建的,房址中间有一圆形灶。在房址内或附近有存储东西的袋状窖穴,遗址附近有烧制陶器的窑址。

马厂类型陶器种类繁多,彩陶图案绚丽多彩。多半以红色陶衣为底,其上再用黑彩绘出花纹。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早期器表打磨较光,晚期只有个别的经过打磨,大部分未经磨光,器表比较粗糙。大量出现红色陶衣,也有少量的白色陶衣。纹饰以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和三角纹为主,构图松散,其中以直线构成的各种纹样特点表现突出。马厂早期虽也有部分红黑相间彩,但其黑

[1] 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4~87 页。

彩多无锯齿,中间的红彩亦多以紫红色为主。马厂前期,彩陶还处于鼎盛时代,此后日趋衰落。到了晚期,彩陶数量大为减少,图案单调,绘制潦草。不仅彩陶如此,其他陶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粗糙,造型简单。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行将结束。在马家窑类型时期,发现过一些将器物口部做成人头形的陶器,半山—马厂类型,仍可见到这样的器物,有的头像面部还画出胡须。在柳湾的马厂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塑着男性人像的彩陶壶。这类彩陶制品,已经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应与人们的某些信仰、祖先崇拜等宗教观念有联系。

马厂类型的制陶术及彩陶绘制技法,反映了这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从这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中,也使人们看到马家窑、半山、马厂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陶器基本上是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的,一些器物的内壁仍保留泥条的痕迹。大型器物的颈、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几段或分别盘好后,再对接起来,然后,在轮盘上修整成器。陶轮也是施彩时不可缺少的工具。绘彩时,把陶器放置于轮盘之上,借助旋转的轮盘,用蘸满颜料的画笔,就可以绘出优美的图案。线条均匀、整齐、流畅及间距相等的平条纹,乃至波纹的纹饰颜色,深浅一致,无起笔、落笔的痕迹,当是把陶器放在转动的轮盘上作画,才可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是二方连续的花纹,也是在陶轮上完成的。绘制这类较复杂的图案,先在器身上将拟绘的图案画面分成若干等分定出几点,而后转动轮子,用弧线、斜线将各点连接起来,从而完成整幅图案。利用轮盘绘制彩陶图案,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彩陶的成批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夏、商、西周时期

夏代的敦煌先民主要是氐、羌两种部族。氐人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兼营饲养业和狩猎;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炼技术,形

成了冶铜业、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羌人是生活在草原、山地的游牧部落人群,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兼营农业种植。

西周时期,关中一带的周人开始向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发展,周人、羌人、氐人错杂分布,周文化得到传播。这一时期,敦煌先民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的经济生活。敦煌各地普遍种植大麦、小麦、黑麦、粟、稷、高粱等多种农作物。在农耕业发展的同时,家庭饲养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品种主要有猪、狗、马、绵羊、山羊和家鸡。西周后期,畜牧业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伴随马具的应用及骑马民族的诞生而不断扩大空间分布范围。

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敦煌文化遗存属于四坝文化类型的火烧沟文化和骗马文化。

四坝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年代为距今3900~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东起山丹,西至新疆哈密盆地,北及黑河下游,南涉疏勒河中上游一带。四坝文化晚于马厂类型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并受到齐家文化和来自北方的某些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支独立的青铜文化。

火烧沟文化是一种独立的地区性青铜文化,年代为距今3900~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玉门清泉火烧沟发现了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石器、铜器和金银器。铜器种类有斧、钺、镰、凿、刀、匕首、矛、镞、锥、针、剑、管、锤、镜等,农具、手工工具、武器、装饰物、仪仗器等一应俱全。这表明包括敦煌在内的酒泉地区先民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冶铜技术,以及对各种矿产的开采、冶炼、制造和使用的较高水平。火烧沟文化的青铜制作是马家窑文化、齐家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论器型还是工艺水平,都较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明显进步。

骊马文化因 1956 年在酒泉境内玉门骊马城村发现刻画有三角纹的骊马式陶器而得名,距今 3500 ~ 3000 年,是分布于丝绸之路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一种青铜文化。骊马文化遗存的分布地域,东起玉门,西到阳关,南起祁连,北达花海长城沿线。它大体重叠在四坝文化分布地域之上,是晚于四坝文化的另一类青铜文化。

三、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敦煌及河西地区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气候寒冷期。由于气温持续偏低,年平均气温和年积温等条件均已不能满足粟类作物生长的需要,种植业生产环境急速恶化,原来以种植业农业为主的羌、氏、周人等人口群体大规模地向气候相对温暖的中原或东南部地区迁移。春秋战国时期河西人口的大迁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从西周后期开始,春秋时期到高潮,到战国时期河西原著居民大部分迁至中原。

原著居民的大量东迁,造成河西走廊的地理真空。而祁连山下广袤的草原,吸引着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于是,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乘机迁入河西,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完成了河西人口主体的历史性转变,也导致了河西农业由种植业向畜牧业的转型。

战国时期,河西走廊主体人口是月氏、乌孙两个民族。月氏人生活在酒泉至张掖、武威一带,乌孙人主要生活在玉门以西至瓜州、敦煌地区。

月氏是一个游牧民族,由许多部落结成联盟,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这种部落联盟,既是社会组织,也是生产组织,更是军事组织。平时是游牧生产的成员,在各自的分地内游牧、打猎,也从事农业生产,战时统一投入战斗。《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一二十万”,说明月氏人口众多,且兵力强大。



乌孙是一个以牧业为主、兼事农业的民族。乌孙的社会组织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组织,已进入阶级社会。乌孙社会实行以昆弥(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昆弥(王)是最高统治者。乌孙实行全民皆兵,平常的生产组织与战时的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

春秋战国时期,岩画、陶画、雕塑、装饰品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大量出现。敦煌附近地区的马鬃山和祁连山区,发现以凹刻、凸刻凿制而成的西汉以前的岩画群,有55组300多幅反映狩猎与游牧生活及带有相互交流性质的画面。其中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东北部别盖乡大黑沟布尔肯哈达又称佛山的大黑沟岩刻画,最为丰富,其画面34组,图案190多幅。内容多数是表现原始的狩猎、放牧、练艺习武、乘马作战的场面,反映了敦煌地区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同时,岩刻画中还有大量的动物形象,如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骆驼、大象和老虎等,充分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的自然生态面貌和环境较现在要好得多,是非常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另外,这一地区还有野牛沟岩刻画群、灰湾子岩刻画群和七个驴岩刻画群。这些岩刻画年代有早晚之分,但画面的内容是较为丰富的,有反映早期牧人及骆驼、大角羊、野牛形象的,有骑马人形象的。其中骑马人和骆驼的形象最多,各种动物形象也较多。从人物装饰来看,不仅有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乌孙、月氏等民族,还有西域民族,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敦煌

一、月氏、乌孙西迁,匈奴占据敦煌

秦朝建立后,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乌孙和匈奴。秦朝初年,月氏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迁出河西走廊,依附匈奴。月氏占据整个河西走廊。

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逐渐强盛起来,但不能和月氏抗衡。为了搞好和月氏的关系,匈奴头曼单于将自己的太子冒顿送给月氏作为人质。

公元前203年前后,月氏被匈奴打败,大部分迁至天山一带。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匈奴攻杀月氏王。月氏再次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又迁至阿姆河流域,于公元1世纪建立了贵霜王国,史称大月氏。留居河西的小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史称小月氏。月氏西迁后,匈奴占据了河西走廊,成为匈奴右贤王的辖区。这一时期,匈奴利用祁连山下广袤的草原,大力发展畜牧业。

二、霍去病攻占河西走廊

西汉建立以后,一直与匈奴处于时战时和的对峙状态。经过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西汉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实力。西汉元狩二年(前121)三月,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1万骑“出陇西”远征河西。霍去病从陇山以西出发,越过屈吴山区,在今靖远县、平川区及景泰县相接的渡口渡过黄河,经景泰县(汉代的媼围县),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渡过石羊河,穿越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领地,经过了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带同折兰王、卢侯王领军遭遇。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1万精兵仅余3000人。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胡王和折兰王均战死,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被俘虏,被斩杀8960人,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这次出征匈奴,霍去病了解了河西的地形地貌以及匈奴在河西的军事部署,为再次大规模出兵河西创造了条件。

元狩二年夏,汉武帝又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役。此次进军匈奴兵分两路,一路由博望侯张骞与郎中令李广分道从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寻找机会和匈奴左贤王作战,以分散匈奴对西线的注意。另一路由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别从北地(今甘肃庆阳)出发,计划由南北两路合围河西走廊的匈奴军